

毛泽东与 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 著

Mo Zedong Yu Zhongguo Zhexue Chuantong

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成都

封面题字：魏传统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古 蓉

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 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200千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933-X/B·56 印数：1—3700

定价：3.05元

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中 开辟毛泽东哲学研究的新途径

——《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序

杨 超

案头上摆着毕剑横同志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传统关系的新作。看完这厚厚的一叠书稿，掩卷遐想，我的思绪被引回到10多年前。记得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两论’学习组”的几位同志在我的病榻旁，讨论如何着手整理我那几十万字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研究的笔记，准备将它提炼成一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在讨论整理书稿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时，就涉及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同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潜心阅读毛泽东著作，认真思考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时，曾不断地在我的脑际萦回。从我以往所接触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里，深感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不仅在《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若干学术专著中有集中的论述，而且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致民间格

言、谚语里，也蕴含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料。这些丰富的哲学宝藏，像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种“共生矿”一样，伴生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里。十年动乱中，我被林彪、“四人帮”投入监牢，这反而使我能集中精力，比较认真细致地钻研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极其深刻的精辟论述，他初上井冈山第2年同朱德一起所总结的游击战争的基本规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他阐述辩证认识过程时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那种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思索功夫；以及在整风文献中，给只会背诵马列词句，徒有虚名而无实学的教条主义者作的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等等，都深深体现他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逻辑思维的印记，如他笔力遒劲的书法一样入木三分。这些使我深切的感到：中华民族是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壤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辩证运动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应当注意发掘和整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丰富资料，并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两论’学习组”经过反复讨论后，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和建议，并提议由毕剑横同志负责这一工作。他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于1978年秋，整理出一本约10万字的《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专题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同“‘两论’学习组”又经过多次讨论，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由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扩展到整个的优秀哲学传统；由仅仅以此说

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到深入阐述这二者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

毕剑横同志写的这部书，充分地反映了我和“‘两论’学习组”的上述观点。作者在大量占有中国哲学史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这些史料加以具体分析，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优秀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毛泽东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素养；特别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和特点出发，紧紧抓住实事求是、实践观点、矛盾学说、军事哲学、唯物史观等几条重要线索，来清理和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关系。

尽管这只是初步的探索，但却是有意义的探索。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一是高度分化，涌现出不少分支学科；一是高度综合，形成了许多边缘学科，若干新兴学科就是这样创立的。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此，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无疑也有这一新的趋势。因此，我们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防止孤立地进行研究。这里，作者在已有的、把毛泽东哲学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联系起来，并进而同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的基础上，又另辟蹊径，把毛泽东哲学思想通过中国哲学史，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使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样，既能使我们较为全面地把握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又能增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充实其研究内容，从而使这两门学科在交叉研究中开辟新的途径，得到新的

发展。

当然，作者所阐述的“两源说”，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除主要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外，还来自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这仅仅是一家之言，它只反映了一个学派的学术观点，读者可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书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提出各自的学术见解，继续探讨，从而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引向深入。

绪 论

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对毛泽东，“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功绩是第一位的，同时又如实地指出了他的错误，尽管这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思想，“决议”重申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科学定义，并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它的形成过程、主要特点和基本内容。虽然，“决议”不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终结，但它确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泛滥，许多人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错误的庸俗化和实用主义态度，加以割裂、肢解、甚至歪曲和篡改。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倾向。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起到了驳乱反正的作用，它恢复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批判了以往对其“拔高”和“贬低”的

两种错误，从而使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我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在这方面的研究反而已经落后于国外，特别落后于日本和美国。仅据1984年的统计，日本在300篇研究中国近代人物的文章中，就有80篇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而且早已出版了相当完整的《毛泽东集》，全面搜集了毛泽东从1917——1949年的文章、讲话、书信等，还附有年表和版本考，并涌现出一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如松村一人、新岛淳良等。在美国也涌现出一些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名学者。如斯图尔特·斯拉姆、弗兰西斯·苏等。斯拉姆还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初评》、《毛泽东》等多种专著。其中《毛泽东》一书颇有影响，翻译到中国后发行量竟达25万册之多。其他如苏联、朝鲜、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而我国，尽管如前所述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气象，但由于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社会偏见和反常心态，一谈到这方面的研究有些人认为不屑一顾，无甚价值；有些人则皱紧眉头，认为难度很大，因此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步履蹒跚，进展不大。当然，这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外，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要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推向前进并引向深入，只限于对“雄文四卷”的铨释和注解，只限于对毛著本身的阐释和说明，或只限于有关历史事件的介绍和考证，是远远不够的了。我认为，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现实，研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毛泽东思想的新

发展，另一方面要联系历史，把毛泽东思想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考察。这不仅要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要联系到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不仅要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要联系到中国哲学史，以及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理论不结合现实，不联系历史，这种缺乏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理论是不充实的。综合性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没有专题研究作为基础，这种综合研究的根基是不牢靠的。对国外的研究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闭关自守多年之后，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这种开放性的研究尤其必要，但必须立足本国，没有对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过细的研究，国外再好的东西也是不能生根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

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杨超等老一辈学者的启发下，在同行学者们的鼓励下，选择了《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这一研究课题。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渊源问题，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外，着重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对毛泽东的研究，则除了考虑其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我们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之一这一特殊身份外，着重从他作为一位学者、一位哲学家的角度，主要从他的中国文化素养和中国古代哲学造诣方面来进行研究。即从上述主客观条件的分析上来说明，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哲学，其思想渊源必须从中西两个源流往上追溯，它是荟萃了中西哲学思想的精华并集其大成的。

对于这个思路，我曾与近年来到中国访问的有关学者，如

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的莱特博士、悉尼大学学者泰伟斯先生等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这是极为有益的探索。此外在我读到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弗兰西斯·苏教授及现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的有关著作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则都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实际上，我对毛泽东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关系的探索，已酝酿准备了10年之久。早在1977年初我参加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整理工作时，他就提出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与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关系问题，要我们搜集资料，进行思考。十年来，我在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在与同行学者们多次交换意见中，逐步形成了以下的一些看法：

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秀哲学传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产生的丰厚土壤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和优秀的哲学传统，主要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辩证思维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优秀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同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在古代曾达到世界上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过重大贡献。

就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一优秀传统来看，从先秦诸子中的墨家学派，到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的荀况学说；从汉代战斗唯物主义者王充，到南北朝时期的无神论者范缜；从唐宋以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这些唯物主义大师，到明清之际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之大成的王夫之，直到近代

汲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严复、孙中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的线索。中华民族这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优良传统，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我们民族经历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艺术活动等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点。这些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善于对前代和同代的哲学思潮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批判的总结，从而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在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尤其明显。他们还善于利用和改造以往的和外来的哲学思想，为我所用。特别有趣的是，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少哲学家都以其独特的笺注儒家经典的方式，以阐发其哲学观点。对外来的哲学思想，注意将其辩证地融合，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而在中国生存发展。他们还善于使其哲学服务于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为其理论主张和政治革新进行论证。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比较注意对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进行哲学概括，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就辩证思维这一优秀传统来看，从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到《易经》、《道德经》和《孙子兵法》这三大辩证法流派；从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到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到集古代朴素辩证法之大成的王夫之，甚至到近代康梁变法和孙中山革命所依据的“变易”、“革新”思想，可明显地看到一条朴素辩证法发展的线索。中华民族这一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是在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我们民族所经历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艺术活动等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在这些辩证法家及其论著中，不少是把“阴”、“阳”这对矛盾范畴作为其朴素辩证法体系的基本范畴而展开

其辩证的论述。他们还十分注意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联结，提出了“一分为二”和“相反相成”的著名命题，把“一两观”作为其矛盾理论的基石。他们还重视对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的探讨，尤其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注目于矛盾转化在变易中的作用。

这些丰富的哲学遗产和优秀的哲学传统，不仅集中体现在哲学专著中，还散见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如在中国古代农学、医药学、天文学等主要学科中，就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农学辩证法、医学辩证法及宇宙结构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在文学作品和艺术技巧中，无论是小说散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里，也都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在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中，也蕴含着深湛的哲理。对这些含有丰富哲学原料的“共生矿”，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开掘和提炼。

总之，中华民族是富于优秀哲学传统的民族，是“哲学之乡”，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植根于中华大地这块丰饶的文化土壤之中，生长于中国这一“哲学之乡”。

二、毛泽东具有的中国哲学素养，是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形成的优越条件

毛泽东自幼就接触中国古书和儒家经典。青年时代，广泛涉猎各种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有着强烈的爱好，尤其酷爱哲学。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爱好终其一生，至晚年而不衰。早在一师时代，他深受杨昌济老师的影响。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在哲学上不仅对西方近代哲学流派如新康德主义等非常熟悉，而且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深有研究。这些对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很有影响，从毛泽东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可清

楚地看出这点。当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不是简单地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摒弃，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予以批判地继承，将其中的精华，辩证地融合于自己的哲学思想里，在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代表作中，以至在其全部科学著作和重要讲话中，都能鲜明地看到这一点。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特别是中国哲学素养，是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传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条件。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批判的汲取

这种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渊源问题上的“两源说”认为，毛泽东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批判的继承。其在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上，出色地运用了它的民族形式，批判地汲取了它的某些理论内容。因此确切地说，这是在毛泽东哲学的思想渊源问题上，有主次的“两源说”。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这一“结合”的哲学概括，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思想渊源上考察，它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它首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则不

仅要从中国社会的“横断面”来认识，即充分认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而且还要从中国社会的“纵剖面”来认识，即认识中国历史及其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特点。也就是说，只有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才能真正谈得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从而也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历来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当谈到如何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就不仅要求我们要注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要求我们要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他严厉地斥责了那种由于不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因而对祖国历史漆黑一团或若明若暗的状况，并特别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祖宗则忘记了的现象。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由于他对包括中国哲学遗产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在党的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毛泽东主张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予以系统地清理和总结，将其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他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贯思想和基本态度，是与列宁的观点一致的。列宁说：“无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522页。

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列宁还说：马克思主义即是“……汲取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

毛泽东正是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历史文化的科学观点，来对待中国哲学传统，加之他又生长在中华民族这一具有丰富哲学遗产和优秀哲学传统的“哲学之乡”，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接触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素养，因此他也有条件在其哲学研究和理论著述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丰富的中国哲学遗产给以清理和总结，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哲学传统，使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著，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仅从1983年底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来看，其中若干书简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22日）等书信，就集中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遗产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先秦时期的几个重要哲学流派，诸如孔子、墨子和老子学派的哲学思想遗产，作了较为集中的批判和总结。对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既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其唯心主义体系，又运用辩证方法分析其中合乎人类认识过程一定环节的合理因素。毛泽东以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命题为例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③由此

^{①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362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页。

可以看出，他对孔子的“批判”，并无全盘否定之意，相反，他所否定的只是孔子作为观念论的唯心主义体系，但却肯定了在这一观念论中所蕴含着的“片面真理”，即其哲学中作为实践论来说的那一部分，并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已接近“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了。他紧接着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①毛泽东对孔子其它重要观点的分析，对墨子哲学和老子哲学的分析，以及对待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以至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分析，无一不是运用辩证的方法，“挈其瑰宝而绝其缁磷。”^②

我们在确认毛泽东哲学思想渊源，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批判的继承的同时，应当指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批判的继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继承，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产生于不同历史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创立起来的崭新的哲学体系。毛泽东哲学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这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已经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地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的任务，不是重新创立革命理论，而是认真学习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指导中国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页。

^②毛泽东：《为肖子昇笔记本题词》。